

纸短情长见家风

●文德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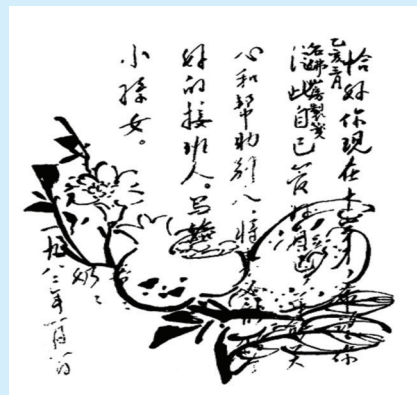
家书,是联结家庭情感的纽带,是映照家风建设的明镜。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书,不仅仅是沟通信息的工具,更蕴藏着理想、教诲和关爱。笔者阅读红色家书,深深地被革命先辈家书中展现的人格魅力所吸引。认真品读,纸短情长,风骨涵养,尽在其中。

真挚质朴的慈爱柔情

红色家书中有牵挂,有关怀。一封封书信,体现了革命者对亲人的关切和挂怀,绵绵情意跃然纸上。

1919年,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员的毛泽东得知母亲病重,几经周转,从北京赶回湖南,接母亲到长沙治病。他写信给舅父文正兴、文正堂说:“闻家母病势危重,不得不赶回服侍。于阳三月十二号动身,十四号到上海,因事勾留二十天,四月六号始由沪到省。亲侍汤药,未尝废离……”千山万水,也阻挡不了一个儿子对母亲的思念和爱。百善孝为先,孝道已经深深融入了中国人的血脉。一封家书,笔墨间流淌出对母亲深深的敬爱和惦念。

不少老一辈革命者一生戎马倥偬,与亲人聚少离多。不过,在繁忙的公务之余,他们也时常惦记着家人。陈毅在给子女的一封信中写道:“你们多温习功课,注意锻炼身体。珊珊要听妈妈的话,丹淮要注意增加体重。你们要劝妈妈多休息,她看书太劳累了……”点滴之间,体贴入微。质朴无华的语言,深切的叮咛,寄托着陈毅对妻子儿女的关爱。



彭真写给孙女小妮的家书。

1982年元旦,彭真和妻子写给孙女小妮一封信,鼓励她养成好习惯,努力做到“三好”。“今天是一九八二年的元旦,我们祝你新年快乐进步,身体好,学习好,工作好!”面对亲人,铁骨铮铮的革命者也尽显柔情。

红色家书流露出的亲情是那么真实。革命者对家人们饱含真挚的爱,温暖的家庭滋养着内心善良的种子,给予他们力量,最终转化成追求真理、奔向光明的动力。

春风化雨的谆谆教诲

红色家书中有教育,有勉励。一封封书信,承载着革命先辈对晚辈的教导和鼓励,谆谆教诲感人肺腑。

刘少奇的儿子刘允奇1954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,留学期间曾有悲观的情绪。他在信中劝勉儿子说:“在你的来信中还表现了一种悲观的情绪,表现了一种错误的悲观的人生观。这是很不好的。青年人不应该有这种情绪……你所表现的这种情绪,必须力求转变,必须对一切抱乐观的态度……”在信中,刘少奇还教导儿子要主动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,写道:“你必须了解,每一个人都应当躲避党和人民的监督,而应当主动地把自己的思想、言论和行动放在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。”

女儿叶楚梅在苏联莫斯科财经学院求学时,叶剑英教导她要在读书时就为建设新中国做准备。他在给女儿的信中说:“让你们后一代,加工的把我们的祖国,建筑起一座自由、快乐、文明、进步、庄严、华丽的世界。你们不能逃避这一责任,你们必须



朱德写给儿子朱琦的家书。

完成你们这一代的责任。因此,当着你们还在学习时期,就应该全心全意的为建设我们完全新的中国而努力!”

谢觉哉1951年1月写信给侄女谢谦芳、侄子谢茂杞等人,勉励他们努力工作和学习,要做一个独立的人,为建设新社会做出贡献。他在信中说:“那想依靠个人比如说依靠我,现在家里还有人是这样想,那是错的。”

革命先辈对晚生后辈的教导、期望和鼓励在家书中清晰可见。任弼时写信给女儿任远芳说“望你更加努力学习,成为一名优秀的专家”;徐特立写信鼓励女儿徐静涵说“你们如果需要我党录用,那么需要比他人更耐苦更努力”;朱德写信教导儿子朱琦说“深入了群众中去,就真正会了解社会主义如何建设”,等等。纸上的语言充满温情,如春风化雨,滋润心田。

坚定不移的理想志向

俗话说:“不怕路长,就怕志短”,家风建设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教育后辈做一个有理想的人。红色家书中有决心,有志向。一封封书信,展现了革命者积极向上的追求,理想信念令人动容。

王若飞在给舅父黄齐生的一封信中写道:“吾幼受舅父教养之恩,未有寸报……我之读宗教书籍,只是为知道当时及现在人们的社会生活,怎样在思想上反映出来。我们的哲学,是认为一切东西都是在流动变化着。我们不仅要认识世界,而且是要改造世界……”他在信中一方面感恩舅父,另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批评其错误认识。家书不仅仅传递情感,更有思想的交流,纠正家庭成员的错误认识,从另一个角度而言,也是革命者自身信念坚定、立志改造世界的体现。

俞秀松于1920年3月给父亲俞韵琴的信中写道:“实验我的思想生活,想传播到全人类,使他们共同来享受这甘美、快乐、博爱、互助、自由……”随信附上的是俞秀松加入北京工读互助团后拍摄的照片。言语间,可见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追求新思想、体验新生活的信心和喜悦。1923年1月,俞秀松写信向父母汇报自己决意从事军事斗争的打算,他在信中说:“我之决志进军队是由于目睹各处工人被军阀无理的压迫,我要救中国最大多数的劳苦大众。”表现出打倒军阀、解救劳苦大众的崇高理想和坚强决心。

没有理想,生命会变得苍白。罗瑞卿致信女儿罗点点说“要做‘大鹏鸟’,决不做‘蓬间雀’”;罗荣桓致信女儿罗玉英说“为人民服务,已成终身职业”;王稼祥致信堂弟王柳华说“做个廿世纪的新青年”……革命先辈在家书中表达理想和志向,激励自己也勉励了家人。

以身作则的高度自律

红色家书中有正气,有风骨。一封封书信,传递着革命者以身作则的正派。

罗荣桓在1949年12月给女儿罗玉英的一封信中写道:“你爸爸廿余年来,是在为人民服务……而不会如你所想的,是在作官,更没有财可发。你爸爸的生活,除享受国家规定之待遇外,一无私有……”在信中,罗荣桓以自身作表率,让女儿罗玉英更深刻地认识到父亲是什么样的人。

杨开智是杨开慧的长兄,曾写信给毛泽东,希望能在北京给他安排工作,或是推荐他在湖南省从事更好的工作。毛泽东回信道:“希望你任湘阴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,不要有任何奢望,不要来京。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,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,不要使政府为难。”告诫他要坚持原则,不要搞特殊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,刘少奇给姐姐刘绍懿写信,向她解释新中国土改政策,信中说:“你家过去主要是靠收租吃饭的,是别人养活你们的……人民政府的法令要办的,你们必须老老实实照办。”刘少奇在信中还劝姐姐:“你们不要来我这里……我当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,你们在乡下种田吃饭,那就是我的光荣。”他劝诫姐姐落实政策,按政府法令办事。

革命先辈以身作则,自我约束,带头廉洁治家。何叔衡曾致信义子何新九“我的人生观,绝对不能为一身家谋升官发财以愚庸子孙的”;陈毅致信哥哥陈孟熙“要想办法,自力更生节约,千千万万告诫家中人等”;吴玉章致信侄子林宇“好好地执行政府法令,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”,等等。革命先辈始终保持作风正派,给家属树立了好榜样。

红色家书让我们更好地感受到革命先辈的心路情怀,同时也能让人对照检视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,修身、齐家是基础。注重家风建设,以身作则,管好家人、育好家风,才能更好地投身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中去,始终做对人民群众有益的事。

■ 我看我说

从丝线经纬中窥见文明之光

●黄超

光彩夺目的服饰文化,折射着古代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发展轨迹,勾勒出中华民族连绵不绝的生活画卷
古典元素与现代创意的融合,给人们带来了更多元、更新奇的审美体验,也助力古老的服饰“正青春”

头戴簪花,手执团扇,衣袂飘飘……春日融融,走在江苏苏州的大街小巷,身着传统服饰的游客频频映入眼帘。他们探访园林、水镇,感受江南古韵今风,也以身“入景”,让人有历史穿越之感。近年来,随着传统文化持续升温,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开始追慕霓裳之美。传统服饰成为不少人塑造个性形象和生活仪式的一种选择。

中国素有“礼仪之邦”“衣冠上国”的美誉。各式传统服装,不止于美,更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,反映着社会整体习俗、思想、技术及其文化特征。秦汉服饰古朴庄重,大唐服饰华贵富丽,宋明服饰娟秀精巧,以及少数民族服饰各具特色……光彩夺目的服饰文化,折射着古代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发展轨迹,勾勒出中华民族连绵不绝的生活画卷。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博大精深,服饰文化一直是其重要篇章,从丝线经纬中可以窥见文明之光、感悟文明魅力。

今天,饱含着时代记忆、文化基因的传统服饰,在社交媒体传播、跨界融合等助推下,由“小众”到“顶流”,焕发出璀璨光彩。更多人“寻衣问道”,通过传统服饰承载的人文内涵感悟锦绣中华的深厚底蕴。于是,我们看到,融合传统与时尚的马面裙成为许多人的“心头好”;新式汉服逐渐成为日常穿搭;新中式纹样、香云纱等成为年轻人喜爱的设计元素;越来越多的人身着传统服饰走在国外街头……人们通过服饰这一表征化符号,表达自己的审美观念、文化态度,也深入传统文化内部,获得雨露润泽。传统服饰,成为表达文化身份的一种方式,也见证着我们的文化认同不断增强,文化自信日趋深厚。

传统服饰“走红”,是当代与传统的一场“双向奔赴”。人们穿着传统服饰,从服装形制、织绣纹样中感受古典美、传统美;同时,越来越多人喜爱传统服饰,也为传统服饰创新发展注入动力。有汉服爱好者介绍,曾经汉服纹饰选择较少,如今市场需求越来越大,“汉服热”带动纹样创新,越来越多汲取自传统文化的特色纹样创新“绽放”,让传统服饰更加熠熠生辉。比如,在山东曹县,有商家将非遗文化融入汉服,皮影成了马面裙的花纹,柳编被做成汉服的配饰,木雕技艺用于搭配汉服的发簪……古典元素与现代创意的融合,给人们带来了更多元、更新奇的审美体验,也助力古老的服饰“正青春”。

对传统服饰的青睐值得欣喜,但这种青睐不能只流于形式,更要深入内在。比如,清代宫廷竖衣上的两只凤蝶,寓意喜相逢;传统服装上的一字扣,承载着古人对于天圆地方、天人合一的认知与对自然的尊重。读懂传统服饰背后这些“未尽的话语”,深入体会其中蕴含的造物智慧、哲学内涵、艺术之美,才能真正品出传统服饰的文化味儿。如今,许多公共文化教育项目正是着眼于此。比如,中国丝绸博物馆连续多年举办传统服饰节,通过展览游览、专题讲座、汉服之夜等活动,创新阐释传统服饰文化之美。更多这方面的努力,将助力人们更好走进传统服饰的“百花园”,深入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奥义。

一件件服饰饱含文化悠长的意蕴,串联起绵延不绝的文化情怀。春风之中飘逸摇曳,多姿多彩的传统服饰让锦绣中华的文化传承,始于衣冠,达于博远。

白居易的宦游人生

●宋超

白居易生于公元772年,此时唐朝虽然平定了安史之乱,但地方上藩镇割据,朝廷中宦官专权,普通民众的生活负担日益加重。作为唐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,白居易没有遇到大唐盛世,对他个人来说,实在是一种不幸。但白居易的出现,又恰恰是中唐时代的一大幸事,让李白、杜甫之后的诗坛不至于后继乏人,也让9世纪的中国历史在文化艺术上多了一抹亮色。

白居易出身于一个“世敦儒学”的中小官僚家庭。在重视门第的唐代社会,他可谓出身孤寒。白居易幼时,全家跟随父亲的职务调动迁徙。在父亲死后,家庭经济很快就陷入了困顿。这也迫使白居易继承家业,走上由科举入仕途,转任四方的人生道路。

在古代,对士大夫来说,宦游是他们的一种主要旅行方式。可以说,白居易的一生几乎都在官僚生涯中度过。一方面,做官保障了他过着比较优裕的生活,让他所著诗文较少散佚,也帮助他成为唐代作品存世最多的诗人;另一方面,宦海沉浮也让白居易一生遭受了不少离别之苦。

白家郡望本在太原,至白居易曾祖白温迁至关中下邳,为祖宅所在。白居易本人则出生于郑州新郑东郭宅。据说不满一岁,白居易便在祖母怀中,就已默识书屏下的“之”字、“无”字(《与元九书》)。在家庭教育的熏陶下,白居易五六岁始学为诗,9岁谙识声韵,为此后的人生打下了基础。

符离:春风野草,苦节读书

白居易11岁时,父亲白季庚改任徐州别驾,白家离开郑州,搬到了徐州以南的符离。徐州自古以来就是四战之地,符离是当时重要的运河枢纽。这对拓展少年白居易的视野有着重要的意义。当地的陈陶澍水、武里山村、草堂石桥、东邻旧院,都被他写进了诗文里面。出任为官后,白居易多次返回这片故园,可以说符离就是他的“第二故乡”。

在符离,白居易最难忘的还是那段勤奋苦读的经历,还有少年的友谊与爱情。他与当地5位

年龄稍长的青年才俊,共同“苦节读书”,过着“昼课赋、夜课书、间课诗”的生活。白居易的刻苦甚至到了口舌成疮,手肘磨出厚茧的程度,眼中“翳然如飞蝇垂珠,在眸子中也,动以万数”。在今天看来,应是用眼过度所引发的“蚊症”。这也为白居易晚年多次提到的眼疾埋下了病根。多年之后,白居易仍然与少时的同学保持着真挚的友谊,共同把酒,怀念那段“朝来暮去多携手,穷巷贫居何所有。秋灯夜写联句诗,春雪朝倾暖寒酒”的美好岁月。

白居易还与邻家少女湘灵有过一段惻惻难忘的爱情故事。“娉婷十五胜天仙,白日嫦娥早地逢。”除了这首《邻女》,白居易还陆续为湘灵写过十几首诗。湘灵家庭出身不高,在白母的坚决反对下,两人最终没有走到一起。直到37岁,白居易才娶了望族弘农杨氏之女。

长安:直言敢谏,长恨讽喻

长安成就了白居易的诗名。传说白居易早在15岁时就来到长安,拜访当时的文坛领袖何逊。原本还在拿白居易名字打趣的何逊,读到那首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后,大为赞叹。从此白居易在京城名声大振。这则故事的真实性被后人所怀疑。不过,白居易在长安崭露头角,是无可争议的。白居易29岁在长安得中进士,“慈恩塔下题名处,十七人中最少年”。在此期间,白居易结识了元稹。长安也见证了元白近30年志同道合的交友佳话。

在长安,白居易直言敢谏。他与好友陈鸿等人登临附近的游仙山时,感念玄宗与杨玉环的爱情故事,几人“话及此事,相与感叹”。由此,白居易写下了千古名篇《长恨歌》,其中就隐含着对统治者的批评和谏言。不久,白居易被擢升为翰林学士,后改为左拾遗。作为谏官,白居易面向皇帝直言朝政利弊,一面写出了许多反映民间疾苦的诗作,如《观刈麦》《卖炭翁》《新丰折臂翁》。当时的他可谓“三十气太壮,胸中多是非”。这些讽喻诗无疑刺痛了许多达官显贵。

成也文章,败也文章,长安也是白居易遭遇

沉重打击的地方。相比于李白、杜甫等前辈直到很晚才获得一官半职,白居易可谓年少得志。不过,他也为自己的直言敢谏付出了代价,被外放为江州司马。后世将这一事件视为白居易思想和生活的转折点。实际上在长安任官的几年间,白居易的心境已经开始发生变化,正如他在诗中写道:“况多刚狷性,难与世同尘。不惟非贵相,但恐生祸因。宜当早罢去,收取云泉身。”(《自题写真》)

江南:乐天闲适,独善其身

44岁的白居易被贬江州,一时饱受沉沦之苦。在这里,他创作了另一名篇《琵琶行》,琵琶女的遭遇也是诗人自己的写照。

在巨大的失落与痛苦中,白居易寻求解脱之道,儒、释、道的思想渗透进他的生活。在江州,白居易多次探访庐山,寻访名寺道观,精神上转向佛教的倾向日趋明显。他开始纵情于山水诗酒,也拓宽了自己的文学之路。

《琵琶行》中说他“住近湓江地低湿,黄芦苦竹绕宅生”。对于南方多雨的气候,长期在北方生活的白居易开始时并不适应。“自作浔阳客,无如苦雨何。阴昏晴日少,闷闲睡时多。”(《霖雨苦多》)诗中提到的“苦竹”,实际上也给了白居易生活上许多慰藉。最早以“食笋”为主题的诗就出自白居易之手:“每日遂加餐,经时不思肉。久为京洛客,此味常不足。”(《食笋》)还有山石榴、山枇杷、菱角、樱桃、江鱼等食物,都为诗人提供了生活的乐趣。这些食物与江州特产湓浦竹、庐山桂、东林寺白莲等,都是白居易歌咏之物。

此后,白居易陆续改任忠州、杭州和苏州刺史,有了主政一方的机会。在忠州,他组织人力在城西开出一条山路,极大改善了当地交通。在杭州修整钱塘湖堤,在苏州开凿了西起虎丘东至阊门的山塘河。

对此时的白居易来说,“无论海角与天涯,大抵心安即是家。”(《种桃杏》)在忠州,白居易常在城外的东坡种植花草。后世苏轼被贬黄州,有感于与白居易相似的经历,自号“东坡居士”。在杭

州,白氏写下“最爱湖东行不足,绿杨阴里白沙堤”的名句。每当梨花盛开时,诗人所爱的当地特产美酒“梨花春”也恰好酿成。在苏州,白居易屡次游览太湖风光,对于苏州的长洲苑、灵岩寺的美景,贡橘等物产,也多有诗词描写。

洛阳:诗酒文会,崇佛悟道

洛阳是白居易的归宿。晚年的白居易多次称病乞假,在东京洛阳担任闲职,致仕后定居洛阳,死后葬在洛阳。白居易在洛阳几乎度过了生命中三分之一的时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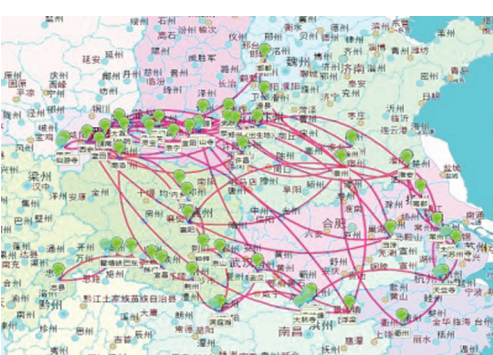
白居易晚年居于洛阳履道坊,在今天那里不过是一片普通的村舍。但在白居易的时代,却是“地方十七亩,屋室三之一,水五之一,竹九之一,而岛树桥道间之”的精致园林。今天的考古工作者确认了宅南的水池面积,证实了当年“竹木池馆,林泉之致”的记载,甚至还发掘出了“开国男白居易造此佛顶尊胜大悲”的残石经幢。白居易的履道坊宅第,在古典园林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。

晚年居洛,白居易颇有沉湎享乐的一面。乐天之乐,一为酒,宋人说他诗中“饮酒者九百首”,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是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”(《问刘十九》);二为乐伎,白居易养了众多家乐歌伎,其中姓名可考者不下九人;三为诗会,白居易常常与刘禹锡、裴度等朋友进行诗酒文会。他还与当时多位致仕官员在家中组织了“七老会”,又在香山组织了“九老会”,赋诗吟唱,既醉且欢。

洛阳的佛寺也成了晚年白居易的精神归宿。经历了好友元稹的去世和独子阿崔的夭亡,白居易晚年将佛教作为精神寄托。白居易常拜谒龙门石窟与寺院,捐资香山寺、重修藏经堂。他还将自己的文集藏入江州东林寺、苏州南禅寺、洛阳善善寺与龙门寺,这可以视为他对自己一生文化地图的回顾。公元846年,白居易去世,走完了自己75岁的人生。他没有随父母兄弟安葬于下邳祖宅,而是葬在了龙门香山寺如满和尚的塔旁。



明代画家郭诩根据白居易《琵琶行》创作的《琵琶图》(局部),描绘了白居易与浔阳歌女邂逅的场景。



根据《唐宋文学编年地图》生成的白居易踪迹图。